第 57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7, No.2
2020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20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互联网与青年价值观塑造：影响机制与引导策略

陈 宝 剑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摘　要：互联网的发展再造了一个既能整合和影响既有线下社会关系又能建立和发展新的线上社会关系的新型社会空间,促使个体(行为)、关系、结构等社会空间要素呈现较为明显的互联网化特点。当代青年是“网络世代”,其价值观受到互联网的深刻影响。作为教育者,如何应对互联网在青年价值观形成和固化过程中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应分析影响机制,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对三个空间要素进行逻辑延伸,可以认为行为要素体现为青年的网络亚文化认同,关系要素体现为青年社交圈层的固化,结构要素体现为青年对传统权威的非理性怀疑。另一方面应提出解决路径,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围绕影响机制给出引导策略,具体包括学习鉴别并灵活运用网络亚文化、实现网络圈层结构的创造性转化、以主流价值观塑造网络传播节点体系。

关键词：互联网;社会空间;青年价值观;教育者;影响机制;引导策略

中图分类号：B 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2-0018-07

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发展之后,人们认识中的“互联网”已成为一个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上的、能够整合社会关系的网络社会空间,它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是人与人互联互通的生存共同体。这个生存共同体具有跨时空互动、去中心化、信息共享、沟通过滤、个人主义、记录可再现、开放自由等属性,促使个体(行为)、关系、结构等社会空间要素呈现较为明显的互联网化特点。因而,作为网络的“原住民”、互联网最活跃的使用者,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形成,势必深受互联网社会空间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综合又多变的。对于教育者来说,网络时代青年价值观引领工作既面临巨大挑战又蕴含丰富机遇。

一、互联网再认识:社会空间及其要素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由于其自身功能作用的不断拓展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逐渐深化,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可以简单概括为 “工具说”“媒介说”“平台说”“空间说”和“社会说”等五个阶段。经历五十余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民数量不断增多,网民主体性作用不断增强。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 54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 2018 年底的 98. 6%提升至 99. 1%①。互联网的发展扩展了网民的活动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空间,为人类的生活开辟了“新疆域”。一方面,“网络”让这一空间成为一个与现实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融合的所在,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虚拟与真实泾渭分明的界限。在社会关系的结成上,网络催生了更多以“趣缘”为纽带的新型的社群组织,其匿名性、虚拟性使得人们身份与角色发生转换,呈现出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生存状态与关系组合。另一方面,“社会”一词也突出了该空间的鲜明特征,即网络社会的社会属性。这些新型的社群组织的成员之间以平等协作、知识沟通、兴趣

收稿日期：2019-12-20

作者简介：陈宝剑,男,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副校长、副研究员。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 2019-08-30。

交流为主,相比于传统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更具自由性和随意性,也更具爆发性和号召力。甚至在一些特定场景下,这些群体可能发生网络上乃至线下的集体行动,并体现出高度的组织化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也是一种空间,而且是一种“社会空间”。可以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空间的物质基础基本建成;同时,随着使用者的增多,互联网逐渐由生产工具向生活工具发展,形成了相互连通的社会关系网。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点、线、面等空间要素可以解释为“行为(个体)”“关系”“结构”。

(一)行为:基于网络身份认同的个人主义表现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网络空间中,现实行为的非语言因素、情景因素和现实社会属性被过滤,大多数场景下的个体身份建构为个体提供了重构个人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机会,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现实身份的束缚。同时,个体以节点的形式存在,彼此地位更向平等化发展,现实社会的基于权力和社会地位而形成的层级关系逐步消融①。因此,基于全新的、复合的互联网身份,以网络节点为存在形式的个体构建起整个互联网社会的社会网络,其焦点是个人而非现实的家庭、单位、社区或其他社会组织。每个节点均能够依靠个人媒介,将声音传递到自己的社会网络中。在这种环境下,信息、传播和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信息传播的控制权逐渐被消解,因此个人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行为呈现出更加个人主义化的特点。

(二)关系:社会群体关系的平移、拓展与重组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社会互动影响并重塑了社会关系。一方面,随着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兴起,家庭、同学、朋友等熟人社交的方式逐渐从面对面走向媒介化,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人际交往蔚然兴起,导致一些原本亲密的关系日渐削弱。夫妻同在一个屋檐下,竟然通过朋友圈点赞交流感谢;朋友们一桌吃饭,各刷各的 APP 等等这些现象屡见不鲜。然而,与地缘、血缘基础上的传统强关系弱化相比,社交媒体促成了趣缘、业缘为纽带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借助社会化媒体平台迅速集合成为社群,并在商业或文化利益的驱动下通过群体边界和群体意识维系并强化社群联系。大数据和算法机制加剧了信息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信息茧房”②。当下,看似网络拓展了交往的可能性,实际上却限制了交往的方向,固化了交往的范围,次元壁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三)结构:互联网社会的去中心化倾向

互联网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使很多普通人有了传播信息的机会。近年来,网络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应用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信息传播的技术门槛,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具有了网络影响力。如果说微博时代,千万粉丝以上的大 V 可能还是一些影视明星,那么直播技术的到来进一步把这种权力转给了更多的普通人。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和应用服务,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权威结构。传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反而成为“草根文化”攻击的对象。

这些都打破了以往权力或资本垄断信息传播渠道的壁垒,扭转了信息交流中的不对称态势,最终促成了互联网社会空间去中心化的结构调整。而在去中心化过程中,控制中心的权威被打破,个体逐步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人人均有可能成为信息中心。例如,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网络问答社区“知乎”的用户数突破 2.2 亿,问题数超过 3000 万,回答数超过 1.3 亿。③ 互联网社会层级由传统社会原本严密的上下关系向扁平化转变,由此形成了分布式网络。个体在其中自主参与问题处理,共享资源,形成了

---

①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 页。

② 2006 年凯斯·桑坦斯所著的《信息乌托邦》中“信息茧房”一词被首次提出。意为:公众的信息需求各有侧重,常因个人兴趣而异,而日渐月染,其自身也会被拘束于如蚕茧般的“茧房”里。

③ 网易科技讯《知乎宣布用户破 2.2 亿知乎问题数超 3000 万》, http://tech.163.com/18/1213/13/E2TLQ9SG00097U7R.html, 2018-12-13。

具有自治效应的分布式网络,“众声喧哗”的信息网状交互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单向度“传—受”模式。

综上,作为社会空间的互联网,是一个既能整合和影响既有线下社会关系又能建立和发展新的线上社会关系的有机系统,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网络在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现实社会中的运行逻辑也塑造了网络空间的规范与准则。① 那么,作为网络的“原住民”、互联网最活跃的使用者,当代青年价值观念的形成机制相较于前互联网时代,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互联网时代独特的青年价值观影响机制。

二、作为社会空间的互联网如何影响青年价值观

立足于立德树人的使命,教育者不仅要关注互联网对青年价值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应该关注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即关注具体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在社会空间的视角下,互联网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机制,实际上就是互联网作为社会空间的“行为”“关系”和“结构”三个要素的逻辑延伸。行为要素主要体现为青年的网络亚文化认同,关系要素主要体现为青年社交圈层的固化,结构要素主要体现为青年对传统权威的非理性怀疑。

(一)行为——文化层面:个人主义推动文化分化,亚文化兴起,冲击主流文化

当个人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行为呈现出更加个人主义化的特点后,网络亚文化的兴盛和自媒体为个体赋权必然成为两股不容忽视的潮流。所谓亚文化(subculture),一般意为从母文化(主流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边缘性的小众文化,往往表现为利用专属文化符号表示自我认同与主流文化的区隔,这种空间和区隔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对于主流文化的仪式性和风格化的抵抗。② 网络亚文化则是在互联网社会空间中呈现的或在互联网催化下产生和发展的亚文化,例如粉丝文化、二次元文化、佛系文化、弹幕文化,等等。所谓自媒体赋权(empowerment),意指自媒体的产生和普及为网民个体赋予更多表达机会和话语权的过程,通俗来说即“人人都有麦克风”和“用户生产内容(UGC)”,主要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等社交媒体体现出来。

应该看到,这两股潮流关系密切,互相强化。一方面,网络亚文化为更多年轻人创造了自我表达的动机和需要,而自媒体赋权则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并且让他们在表达中进一步建立对彼此之间成员身份的认肯,增强对现有的特定网络亚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自媒体赋权加快网络亚文化的生成、传播和迭代速度,为新的亚文化提供素材。

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的影响力逐渐被网络亚文化稀释。原本在现实社会空间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主流文化,在互联网社会空间中面临诸多亚文化的激烈竞争,由于亚文化更个性化,更新潮,更符合青年趣味,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往往胜于主流文化。这种稀释又进一步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空间,导致主流文化不仅在线上的互联网社会空间里“失声”,也在线下的青年活动中“遇冷”,难以对青年价值观产生有效影响。前些年人们对粉丝文化影响下“纪念明星而不纪念将军”的现象讨论颇多,这就是网络亚文化稀释主流文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关系——圈层层面:“趣缘”社群强化信息茧房,固化观念成见

随着互联网社会空间开始去中心、去层级,人与人、人与权威的联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个体高度分化之后,会基于个人兴趣和对不同内容的偏好,进行重组与聚合,最终形成一个高黏度、高聚合力的社群组织,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趣缘”社群。

应该看到,“趣缘”社群对于青年拓展社交网络、培育兴趣专长都有积极意义,但这种社群的相对封

---

①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第 87—92 页。

闭性可能会形成一堵无形的信息围墙。当不同“趣缘”社群在“信息茧房”影响下不断固化、强化乃至极化价值观时,基于不同趣缘属性形成的圈层结构将进一步产生基于不同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属性的圈层结构。青年长期习惯于在特定的网络社群中接受信息,可能会落入上文提到的“信息茧房”——“个人议程”覆盖了“公共议程”,其固有的价值观在高频次同质化的“回音室”互动中不断固化和强化,难以产生内部的自我反思性批判,也为外部的优化和引导制造了障碍。

(三)结构——权力层面:空间重构导致主体平等化,解构传统权威

互联网社会空间对人类生活最深刻和最根本的改变,是对现实社会空间中主体间关系的突破,集中体现为现实社会空间中的层级分布和权力关系由垂直化向水平化转变,人与人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平等。

政治学将权威理解为“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① 在价值观的语境下,我们将权威理解为由官方倡导的,受到广泛信服,有强大影响力的主流价值观。当单向度的传播变成了“众声喧哗”的网状交互时,现实社会空间中的传统权威面临极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现实空间的权威媒体进入互联网社会空间并最终树立权威,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力量将更大可能地影响青年价值观。第二,互联网社会空间中舆论的碎片化和反转现象导致青年要么易受热点和谣言影响,难以建立价值判断的稳定标准,要么选择怀疑论立场,彻底怀疑一切价值权威。第三,现实社会空间中集中的权威被互联网社会空间中新兴的、分散的权威所取代,例如各式各样的“大 V”“网红”。第四,根据后现代主义逻辑,“解构权威”意味着权威本身就是不重要的、不存在的,甚至可笑的,是一种隐性而深刻的消解。着眼于此,当青年过分沉浸网络游戏、短视频等媒介时,“娱乐至上”乃至“娱乐至死”的氛围习染也将可能使青年导向疏离现实、背离权威的虚无主义态度。

三、基于影响机制的青年价值观引导策略

一切教育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个体间通过知识分享寻求精神理解的行为。对思想教育工作而言,其最终目标在“寻求精神理解”之外,更要求“实现心灵认同”,因为思想教育工作必然带有“去中立性”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倾向,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维持政治秩序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赢得了互联网,谁就赢得青年”。当互联网成为除现实世界之外的第二生活向度并不可避免地对“网络世代”的青年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时,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摆在教育界面前急迫而重要的问题。

从“行为—文化”“关系—圈层”和“结构—权力”这三个层面可以理解作为社会空间的互联网如何对青年价值观产生影响,同样,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合理利用这种影响机制,实施操作或干预,实现对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养成以及对偏差价值观的矫正、重塑。

(一)顺势而为,学习、鉴别并灵活运用网络亚文化

应该承认,当主流文化的影响力逐渐被网络亚文化稀释的趋势不可阻挡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用形而上学的观念对“非主流”文化的兴起和作用给予“一刀切”的否定,更不能制造壁垒,甚至主动站到对立面去,而应顺势而为,学习、理解、研究、分析网络亚文化,乃至利用、善用其话语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网络亚文化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

第一, 敞开胸襟怀抱,关注不断涌现出来的网络亚文化,透过网络亚文化了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对症下药”的面向人的工作,摸清教育对象关注的、喜爱的、追逐的事物,是有效进行教育的前提。一方面,当前,网络亚文化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即便是刚毕业不久的辅导员都很难完全弄懂“Z 世代”的话语。而对于一些“深宅”“忠粉”的青年,如果教育者无法通过其圈层的话语

① 俞可平:《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社会科学文摘》2016 年第 8 期,第 40—42 页。

与其交流,很难与其建立基本的友好和信任关系,陷入“新话不会说,老话不管用”的尴尬,更谈不上融入其圈层。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平台的快速更迭使各种亚文化呈现出“日新月异”的传播与发展态势。如今网络亚文化在稀释主流文化的同时,二者的边界在逐渐模糊,相对地位随着时间发展不再固定。主流文化吸收融合了很多网络亚文化的元素和话语表达方式,网络亚文化也可能衍变为全民接受的主流文化。比如,以抖音、快手等移动 APP 为代表的短视频文化,两年前刚刚兴起,随着用户和流量的大幅度增长,逐渐从部分青年接受发展成“国民级短视频产品”,《2018 抖音大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 2.5 亿①。这些都要求教育者对网络亚文化有更深的认识与了解。因此,教育者要有足够的包容和胆量,在坚持底线的同时,学习、理解各种网络亚文化,真正与网络亚文化背后的青年展开对话。

第二, 辨析价值成分,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网络亚文化。作为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许多网络亚文化包含的价值成分呈现出“两副面孔”,并不能简单地用“正”“负”来划分。例如,“夸喷群”的兴起一方面包含着欠缺深度的速食文化、娱乐戏谑的话语狂欢等互联网时代的消极价值,另一方面作为青年在多重焦虑压力下的相互调侃和情绪宣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反映了积极向上的一种自我调适。必须指出的是,“存在”是“质、量、度”的统一,对亚文化中某些价值成分的过多强调和偏差理解,都可能导致量逾其度,以至于“变质”。特别是在资本力量深度渗透网络空间的情况下,“制造焦虑”“炮制热点”“精准推送”等商业运作手段加大了亚文化产生不良影响的风险。这要求教育者结合时代特征和青年生活实际,对良莠不齐的网络亚文化进行深刻的辨析和研究,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避免青年受到亚文化中负面价值成分的不良影响。

第三,创新教育模式,利用网络亚文化的仪式性和风格化特点,将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输入网络亚文化中,积极借助其接地气、有人气的话语方式和呈现形式,创作青年喜闻乐见的教育产品。对于在不颠覆道德秩序前提下衍生及发展出来的网络亚文化,我们应该主动把握、挖掘和利用,寻找“最大公约数”,使其成为青年价值观培育的机遇。如《中国有嘻哈》等系列综艺节目的播出使嘻哈文化从小众的、地下的“边缘”文化转换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后,嘻哈说唱歌手们创作的《我们是龙》《中！国！万！岁!》等原创歌曲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成功引导、激发和带动了青年发自肺腑、充满自信地表达爱国热情。因此,当网络亚文化以积极的姿态融入核心价值观时,必将丰富主流文化的传播载体和教育模式,核心价值观和青年之间的有效沟通路径也将得以拓宽。

(二)融入对话,实现网络圈层结构的创造性转化

基于趣缘形成的互联网圈层结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的封闭、反思的缺位甚至观念的极化,对青年价值观教育带来了挑战。但在社交媒体深刻影响青年生活的今天,互联网社会空间中结构圈层化已成定局。趋势不可扭转,但可以转化。

第一, 面对圈层分化的互联网社会空间,“大水漫灌”式的价值观传播显然无法满足不同圈层的个性化趣味,难以“入脑入心”。如果措施得当,实现“精准滴灌”,圈层结构对青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进而转化为具有正面影响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精准滴灌的前提是水分能够渗入土壤,有针对性与亲和力的圈层传播是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强化针对性和亲和力。这对于主流价值观的网络圈层传播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教育者要让自己成为互联网的积极参与者,越是充分认识和体验互联网,越能够在适当的网络平台上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精准发力,将价值引领的“盐”撒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载体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在具体策略方面,可以诠释和凸显特定圈层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中包含的主流价值观,例如人民日报通过点赞拥有 2000 万粉丝的

① 字节跳动算数中心:《抖音 2018 年度数据报告:60 后爱晒娃,70 后 80 后爱跳舞,90 后爱自拍》, https://www.toutiao.com/a6651847937489895947/, 2019-01-29。

“李子柒”来弘扬文化自信价值观;也可以对特定圈层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言论和行为进行认可和宣传,例如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媒体对中国队在亚运会 LOL 游戏表演赛夺冠的报道。

第二, 价值观直接影响和体现了个体身份认同,而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个体的身份认同中包含着对“他者”的定义和想象。在现实社会空间中,个体身份认同过程在不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可以正确理解和对待“他者”。在互联网社会空间中,由于圈层结构的存在,不同群体之间排斥对话和交流,对“他者”的定义和想象往往陷入“非友即敌”的思维。要改变这种思维和意识,必须建立起不同圈层结构间的对话和信任体系。如前文所述,面对不同网络亚文化缔造下的趣缘圈层结构内的青年,教育者要保持开放性的学习心态,既要学习和使用所接触学生圈子的“话术”,了解网络文化元素和新兴网络话语;又要从内心尊重和理解青年的网络世界,日常教育中首要注重与学生的平等对话,不懂、不理解的地方主动与青年沟通、请教,进一步破除传统的师生二元区隔模式,改变“我讲你听”的传统互动状态,从“宣讲者”转变为“倾听者”,先做“同路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引路人”。

(三)重塑结构,以主流价值观塑造网络传播节点体系

有学者认为,自媒体时代下,信息的传播轨迹中,担当不同角色的节点可以分为:核心节点、桥节点、长尾节点三大部分。核心节点是信息生成的源头;桥节点是核心用户传播信息的扩散者,起到桥梁作用;长尾节点是沉默的大多数,要借助桥节点的作用才能接触到核心节点的信息。他们单个发言的影响力小,但集合起来却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① 因此,互联网社会空间中的权威的解构源于主体间关系模式的变革,权威的重构则有赖于节点体系的再造。

第一,建设一批具备充分权威性的“核心节点”。近年来,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中央等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已经为青年价值观引领提供了许多优质的“核心节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教育者也应该因地制宜,立足学校特点,多维度塑造校园官方媒体的权威。首先,权威性的关键在于捍卫主流价值观,这需要坚定立场,砥砺斗争意志,与错误的舆论观点、思想观念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关键时刻下、关键场景中敢于亮剑碰硬,敢于论辩发声;同时,在姿态亲和、融入青年话语方式时,也应坚持严肃性与活泼性相结合,避免泛娱乐化表现。其次,权威性的保障在于扩展发声平台,融入更多传播媒介,重视“两微一端”建设,积极进驻抖音、B 站等新兴的媒体平台,在互联网社会空间中占领更多阵地。再者,强化权威性需要发挥不同功能、不同层级校园官方媒体的“比较优势”,根据不同“节点”特征、受众群体特征,创新传播方式、内容与话语体系,实现精准供给,形成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协同合力;在关键事件中利用校园媒体的资源聚合效应,集体发声,强化观点权威性。

第二,在青年群体中建设一批积极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桥节点”。在更具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互联网社会空间,仅仅依靠若干“核心节点”仍不足以把握价值观教育的主导权。在由青年主导的“后喻文化”②场域中,垂直向度的灌输传播往往不如水平向度的“朋辈教育”。因此,在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吸引更多青年师生参与进来,充分发挥“青年意见领袖”的引领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对此,既要注重依托党、团组织开展动员,让线下的青年骨干成为线上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桥节点”;更要积极引导、支持和吸纳那些乐于、善于运营自媒体的青年师生,激励他们发出主流声音,培育更多“正能量网红”“红色大 V”,实现官方媒体和青年自媒体的交互构建。

第三,与时俱进开展青年网络素养教育,增强“长尾节点”价值判断力。“长尾节点”看似小而分散,但恰恰是这些分散的互联网用户,聚合起来就可能成为强大的舆论力量。如果青年群体网络素养低下,缺乏价值判断力,那么互联网社会空间将会充满风险。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国内外风险挑战致使网络意

---

① 喻国明:《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1970 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后喻文化”是指年轻者向年长者传递知识的文化形式。

识形态安全面临考验;“后真相时代”①的谣言和反转让许多青年无所适从,难以鉴别。这要求教育者因时而进,创新开展青年网络素养教育,把握好真相明晰、谣言破灭、舆论回转的契机,用事实说话,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和沟通中让青年培育理性心态,树立正确导向,逐步增强价值判断能力。

The Internet and the Shaping of Youth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pac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Guidance Strategy

Chen Baoji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created a new type of social space that canintegrate and influence offlin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stablish and develop new online social relationships. Consequently, such elements of social space as individual behavior,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e have become more obviously characterized with networking. Contemporary youths are called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whose values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e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discuss how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fixation of youth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ducator. On the one h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should be analyzed through the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he general-to-specific approach. The behavior elemen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dentity to the youths' Internet sub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element is embodied as the fixation of the youths' social circles, and the structure element is embodied as the youths' irrational skepticism to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pose solutions which are guidanc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in the abstract-to-concrete approach.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se solutions include how to learn to identify and flexibly employ the Internet subculture, to realize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circles, and to shape the node system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with mainstream values.

Key words: Internet, social space, youth values, educator, influencing mechanism, guidance strateg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2016 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相对于客观描述事实,诉诸感情和个人信念的信息更能影响民意)”。